

1514

临沐县文史资料



政协临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八辑

临沐文史资料

政协临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月

EA97/27

编 审：徐敏瑞 刘金科

杨爱华 袁堂忠

李培德 王洪亮

解桂茹 王维玺

主 编：高田熙

特邀编辑：时 麟

前　　言

199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人民政协五十周年华诞，澳门回归祖国——这都是足以在共和国历史上刻下深深印记，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让当今和后世人们牢牢记住的大事！

作为我县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独特作用的《临沭文史资料》，应当也必须在这一举国同庆的时候为之献上一份厚礼，以表达全县人民的爱国之心及喜庆之情。为此，县委办和县政协办于1998年12月18日联合发了通知，在全县范围内征集稿件；我们亦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组稿、约稿。应当说，很多单位及部门的领导和作者是非常重视的，把总结本单位、本部门的成绩、经验及发展同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很好地结合起来，按时按要求写出了

质量较高的稿件。但也有一些单位和部门未予交稿；加之市政协《光辉的历程》一书组稿，许多来稿又选送市政协入书。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重新组织稿件，将原定的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专辑编纂成如今的第八期选辑了。

专辑有专辑的优点，选辑亦有选辑的好处。本辑中不仅有建国五十年来我县广播电视、自来水、教育等企事业以及植桑养蚕、柳编生产等农副业的发展记实，也有记述战争年代重大事件、人物、革命民歌的史料，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亲历记，还发表了时麟和孙加宽同志分别对建国后在我县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内情鲜为人知的“十九人反革命集团”、“李丙节做皇帝”两案披露文章。此外，“文革”奇文及乡土名人张宝信的遗作，读来也让人感慨良多，深长思之。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讹疏漏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1999.10

目 录

发展纪实

- 临沭县推行农业大包干纪实 明华祥(1)
临沭县广播电视发展掠影 武超群(14)
发展中的临沭县自来水公司 时麟 高明范(21)
植桑养蚕奔小康 毛圣范(33)
源远流长的临沭柳文化 王朝学(41)

教育新篇

- 辛勤耕耘铸辉煌
——临沭一中 46 年发展侧记 李景涛(51)
栉风沐雨为“三农”
——临沭县职业中专办学纪略 荣学文(63)

史海钩沉

- 滨海中学纪事 刘树棠(69)
沭河壮歌 袁均念(76)
后湖子村兵工厂 温 永(92)
神枪手高顺桥 高 波(98)
革命民歌选 高树排 孟凡玉(105)

战事亲历

- 攻克谅山 卢奉银(129)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日日夜夜
..... 武宣志(137)

苍马名胜

- 清真寺今昔 白广军(147)
青龙山 袁均念(157)

大案披露

- “十九人反革命集团”错案追记
..... 时麟(164)
李丙节的“皇帝梦”及其破灭
..... 孙加宽(191)

文革奇文

- 满纸荒唐见峥嵘 文史委(206)

名人遗作

- 高友三祝寿辞 张宝信(219)
吴小岩先生传 张宝信(227)
游石门记 张宝信(231)

古体诗

- 贺县诗词组成立 李昌平(235)
祝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 李昌平(236)

- 书法 袁堂忠(封三)

临沐县推行农业大包干纪实

明华祥

临沐县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简称大包干),是从1979年参观学习凤阳开始的,是在两种思想、两种认识的矛盾中逐步推开的。其发展之曲折、斗争之激烈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业问题先后发出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两个文件。在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中,“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为农村深化改革的纲领。许多省、地纷纷在农业经营管理上进行探索,其经验做法经常在报纸上登载。当时临沐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把改革农村经营管理的工作交给农办。其时我任农办主任主持农办工作,担子就落在了我的身上。重任在身,所以我十分重视报纸上的有关报道。1979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记者吴象报导的“从

凤阳得到的启示”一文。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受启发和鼓舞，觉得凤阳的经验值得学习推广。可以说，就是这一篇文章使得我县的“大包干”揭开了序幕。

一、参观凤阳

1979年12月23日，县委书记张志奎同志责成我带队去安徽凤阳学习，一起去的有农办、县委办、党校、科委、农业局以及嵒山、泉埠、周庄三个比较贫困的公社的党委书记，共九人。到达凤阳的次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廷远同志和农办、调研室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经验，当时凤阳的作法一是在生产队的基础上分组作业，联产承包；二是包产到户。介绍完后带我们到农村和农户家中参观。第一站到了大包干的发起者小岗村。所到之处，干部群众对农业大包干心满意足，农户家中都是粮满仓，柴满院，猪满圈。干部群众都高兴地说：“农业合作化二十多年没能解决吃饭问题，搞了大包干一年多就解决了。”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再干一两年我们就要建新房、买机械”。我们感到深受教育和启发，简直觉得是进入了

另一个世界。所以，也都一致认为这是农村改革的方向。同时，我们也想到“文革”中把包产到户作为重点批判，上上下下都忌讳“包”字，推行起来一定难度很大。参观中，陈廷远书记也谈到这一点，他问我们：“你们来参观，上级党委同意不同意？如果不同意，你们回去不但推不开，还要受到攻击。”他又说：“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在搞大包干时就发生了几次曲折，是省委书记万里来我县亲自支持才得以推开的。”为了多学些经验，我们又到了嘉山县、全椒县，要了一些典型材料，总之是满载而归。回来以后，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向县委回报。大家意识到联产承包在目前是新生事物，推行起来一定充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由县委常委集体听取参观人员的回报；汇报内容就是听的什么，看的什么就回报什么。1月2日，县委常委集体听取了回报。由于都怕担风险，会上多数领导同志都不表态。最后形成的决定是由参观人员先搞试点。

二、曲折前进

试点在泉埠公社小河涯村。群众是真正

的英雄，小河涯村干部群众对实行大包干都很同意，他们认为，好处有八条：一是能增产；二是分组后单位小了便于领导；三是非生产人员减少，非生产性开支自然减少；四是土地能精耕细作；五是社员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六是大锅饭变成小锅办，能做到勤俭节约；七是收入分配时减少很多麻烦；八是干群关系改善了。这次座谈会精神很快传到各村，几天后这个公社的 31 个大队，有 18 个报名搞分组作业包产到组。据此，我们建议去参观的 3 个公社都可以搞试点。县委同意后，从县机关抽调了 23 名同志会同 3 个公社的干部搞了 16 个点。1980 年春季，我们总结了 16 个点的经验做法，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让干部群众选择：一是统一耕种，统一收获分配，中间管理包工到组或户，简称统两头包中间；二是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即定土地、劳力、计划、成本、牲畜农具，超产奖励，简称五定一奖；三是以队为基础，分组作业三定三包，按劳分配，每 10 户左右为一个组，由组上交和分配，叫做交足国家的，保证集体的，下余为自己的，简称大包干。

我们还提出各级领导不要硬性规定，更不搞一刀切。

1980年10月9日至11日，临沂地区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和具体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参加，我同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当时上级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明确的文件和部署，所以，我县汇报时没汇报去凤阳参观，只汇报了组织干部搞了十六个点（全地区只有我们去凤阳参观）。会上地区一位领导讲：我们是老区，合作化基础好，干部经营管理水平高，不能搞什么家庭联产或大包干。这就是说，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路子不对。回来传达会议精神后，原本思想就不通的同志，更有了理由反对推行大包干。他们指责主张搞大包干的是单干的急先锋，带头人，甚至上纲上线说什么：“大包干就是破坏人民公社，就是走资本主义”等等。主张推行凤阳经验的人也顾虑重重，缩手缩脚；部分人在观望；两种思想认识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

1981年4月底，地区专门召开了农村经营管理会议。我和经营科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地区领导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反对推行大包干。会上，日照和莒南县的农办主任首先发言，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指责：“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群众的要求，绝大部分群众反对搞大包干，即便放手搞，同意的也不会到 5%”。会议期间展开了辩论，但争论了两天，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的焦点，就是大包干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双方都提到方向道路和农村体制政策的高度上。最后地区农办负责人讲话明确指出，不准搞分组作业，特别不能搞大包干，大包干等于单干。5月初县里召开了一次大队支部书记参加的农村经营会。县里分管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六个不准。即：①不准分组拆队；②不准分掉集体机械；③不准分掉集体副业；④不准社员个人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⑤不准搞什么作业组分配；⑥不准拆散生产队队委会。另一位负责人在大会上讲，“中国单干了几千年没有富，现在又搞单干就能富了吗？我认为，情愿戴上僵化半僵化的帽子，也不能搞分田单干。”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焦点还是

方向道路问题，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主张大包干的同志受到了攻击。反对者以社会上个别不满的人编的顺口溜作为“枪弹”：什么“拆了队，分了牛，社会主义到了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县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对主张大包干的同志进行了批评，说：“你们要犯大错误。”为了彻底阻止大包干，这位领导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农村基层干部、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坚决顶住单干风；并要求各公社把已分组的和包产到户的抓紧再合起来，恢复原生产队的体制。一时间，推行大包干工作陷入低潮。

但是，社会的发展毕竟不是由部分人的意志所阻挡得了的。广大农民乐意搞，大多数基层干部也都同意搞，许多原来分组的大队虽然合了也是明合暗分，多数还是继续分组包干。基层干部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80年中央发了七十五号文件，重点讲了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把大包干作为农村深化改革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肯定下来。按理说，这不应该再出现什么问题了，但

县里有些领导仍是断章取义，取其所需，说：“中央指的是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我们不包括在内。”继续反对推行。

这年秋收以后，许多基层干部反映，从收获结果看，分组作业的比生产队大呼隆的好，包产到户的更好。为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组织人员到农村，特别是到包产到组到户的村庄调查。周庄公社李蒿科大队春季分的组，麦收后包分到了户，粮食亩产比 1979 年增产 110 斤。支部书记李长存说，过去春播花生十天完不成，今年抗旱播种三天就完了；1979 年全村分配现金 3 千元，今年能分 2 万元。南古公社班家官庄大队，历年欠贷款八万多元，是个无机械大队，1980 年春，先把 850 亩花生分包到户，承包是亩产生米 120 斤，实产 157 斤，向国家交售 11 万斤，归还贷款 3 万元；全村购买 12 马力拖拉机 5 台。社员分配 1979 年是 39 元，这年是 110 元。群众高兴地说：“办社二十多年啦，今年俺是第二次分现金；第一次用上了俺自己的拖拉机。”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实际收入都大大高于“大呼隆”时。到 1981 年

春，“大包干好”的呼声日渐高涨，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县的个别领导仍是顽固坚持。他们精心组织了这样的会议：会议分东西两片召开，西片 25 个大队，在南古公社的寨东大队；东部 20 个大队，在蛟龙公社的东盘大队。会议的中心内容是为这些还没有实行大包干的大队鼓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稳住群众情绪，坚决不分组，不包产到户，保住人民公社的一块地方，为发展社会主义树立样板。会上有的大队干部表态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顶住。”

1981 年夏收后，我们又到大包干搞得早的大队调查，调查的结果更是令人振奋，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这时，《人民日报》刊登了湖南的一则消息，文章指出：对待联产承包是：中央放，群众望，中间设了顶门杠。对推行生产责任制过程中部分中层干部的思想作法批评得很尖锐。这对解放思想、推行大包干工作，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全县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1981 年 7 月 15 日，县委召开了生产责任制座谈会，由公社

书记参加，并吸收部分责任制搞得好的大队支部书记参加。到会的同志，人人发言，讲自己的认识，讲大包干带来的变化，讲农民如何满意，增产效果如何突出。会上我把我们一年多来通过调查研究，汇集的大包干工作中的作法和注意的问题三十条作为征求意见稿，向会议传达。会后全县上下议论纷纷，奔走相告，主张大包干的放下了思想包袱，思想不通的通了，反对的也默认了。县里又于 8 月 23 日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首先学习了中央七十五号文件，以上形成的三十条县委以正式文件印发，由县委负责同志向大会传达。实行生产责任制好的两个公社、八个大队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介绍了他们大包干的作法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推行大包干后的巨大变化。嵒山公社东萨庄大队的发言对与会人员震动最大。这个大队是出名的贫队，他们 1980 年春实行分组，秋种全部包产到了户，包干的优越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 调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吃大锅饭时外流东北的 28 人、去西安打工的近百人，现在全部回来